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

总编 李 新

中华民国史

第八卷

(1932—1937)

上

周天度 郑则民 齐福霖 李义彬 等著

中华书局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

总编 李 新

中华民国史

第八卷

(1932-1937)

上

周天度 郑则民 齐福霖 李义彬 等著

中 华 书 局



“一二八”淞沪抗战中的中国炮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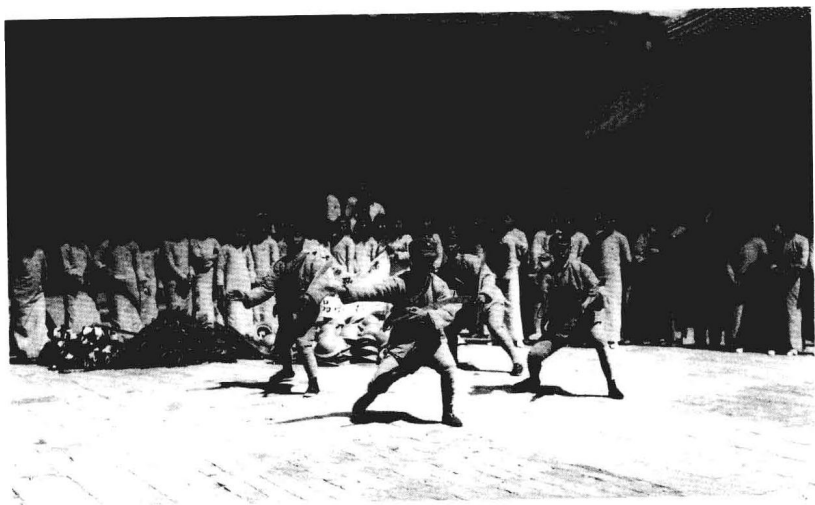
“一二八”淞沪抗战中的中国步兵。

大同日報
 抗戰軍報
 均鑒。密淞滬停戰撤兵協定已於
 1654
 1937
 歌日簽字全文業已公布此次協定成立實係
 照國聯決議
 關於
 協定內容我方始終堅持者為限於日軍撤
 退不得附帶政治性質之條件此點已
 至於日軍撤退由共同委員會負責監視對於
 違背協定隨時可以提出制裁自昨日起日軍
 已依照協定開始撤退我方亦已開始接收地方
 矣惟中日問題
 在東北政府仍本向綏芬
 針以交涉與抵抗並行期得最後之解決特此通
 告諸惟察察
 何
 王任
 蔣介石
 廣西陸軍司令部
 總司令
 蔣介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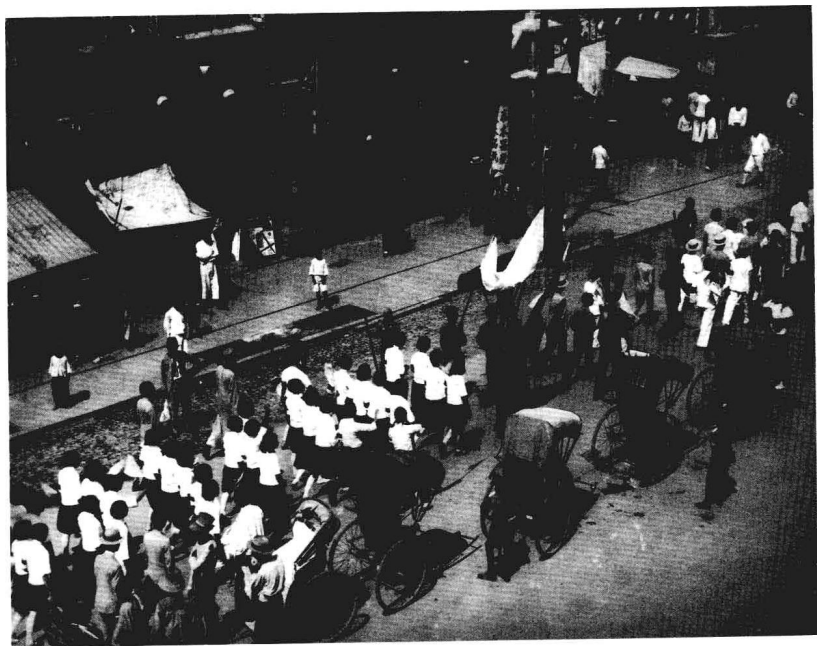
蔣介石在淞滬停戰電報稿上的修改手迹。



日军杀害中国抗日义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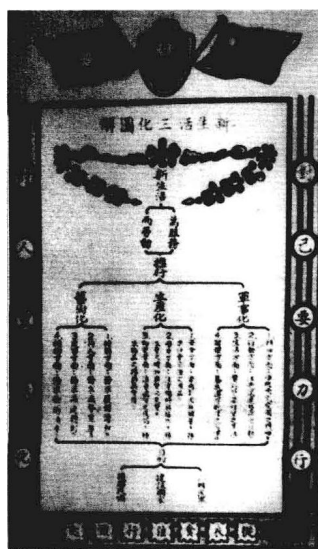
二十九军大刀队为民众表演。



1934 年夏，南京学生游行要求抗战。



蒋介石视察庐山军官训练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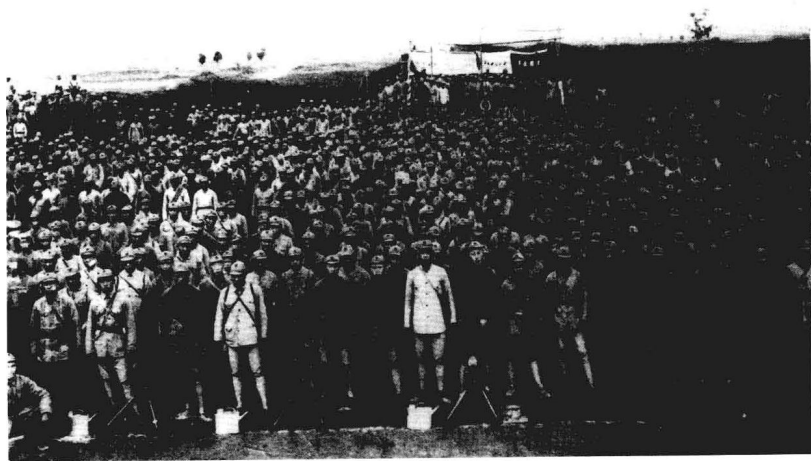
新生活运动宣传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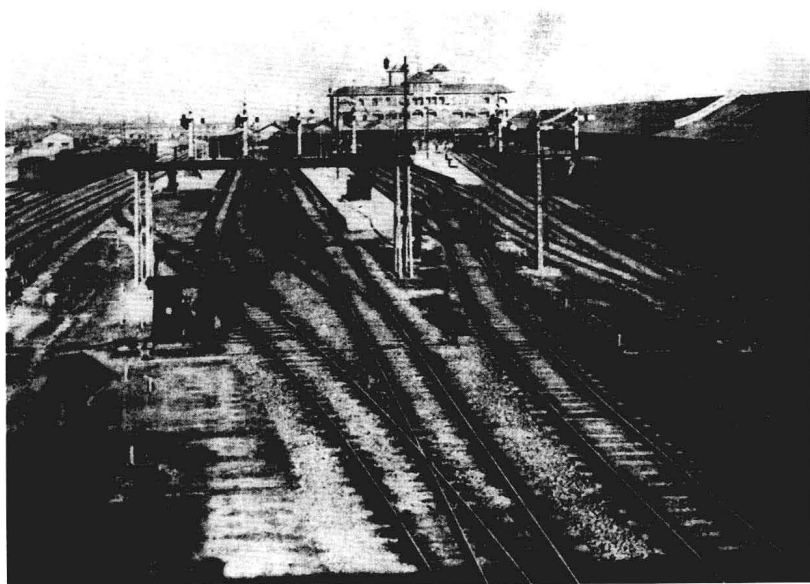
国民党军在第五次“围剿”中修筑的碉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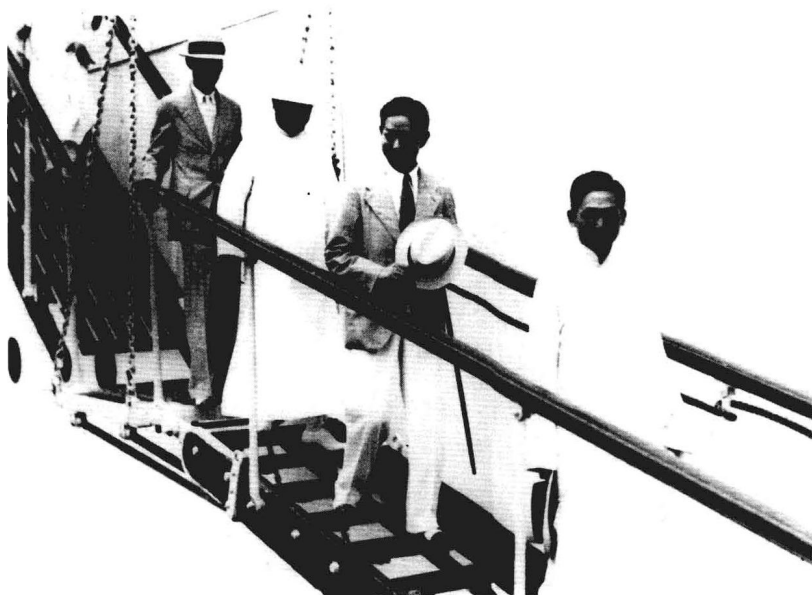
闲暇时的红军士兵。



长征前的红军。



南京浦口列车编组站。



1935 年，梅兰芳访欧归国。



国民政府高官拜祭中山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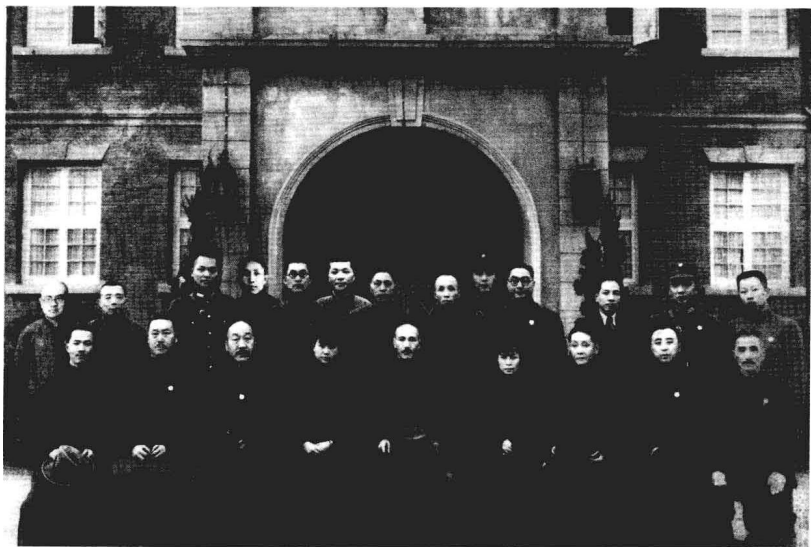
救国会领导人参加上海抗日游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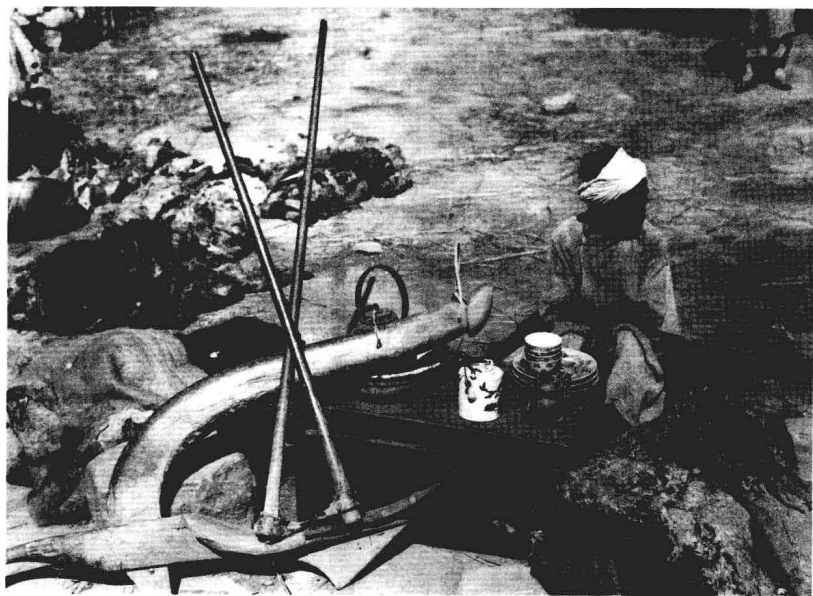
参加 1936 年柏林奥运会的中国足球队。



1936 年 10 月，在上海举行的鲁迅葬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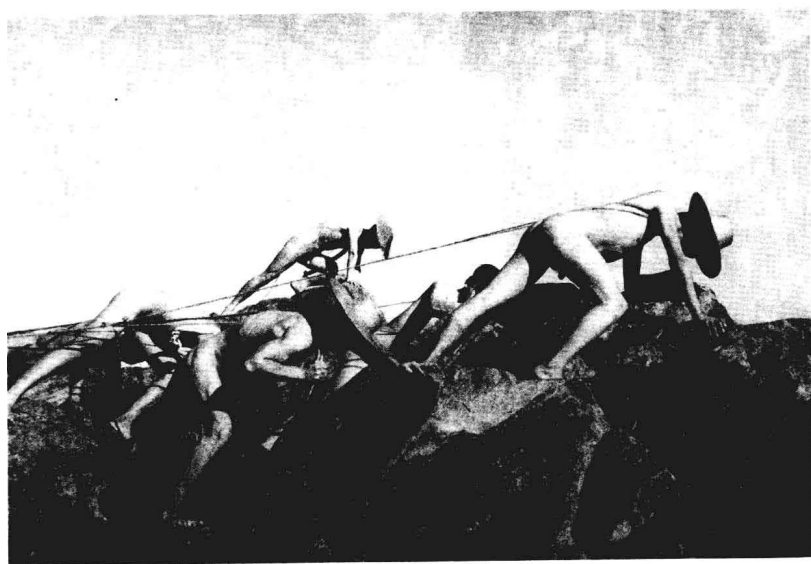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与下属合影。



1937年四川旱灾中的灾民。



中国农村的梯田。



长江上的纤夫。

前 言

本卷内容起自 1932 年淞沪抗战,迄至 1937 年“七七”事变,共计五年半时间。主要叙述这一阶段的民国政治、军事与外交,也涉及财政、金融、经济、教育及科学。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由于国民党和东北当局采取不抵抗政策,东北三省迅速沦亡。1932 年初,日本为了转移国际社会对其侵略中国东北和策划成立伪满洲国的视线,并打击上海的抗日活动,又在上海挑起战争,布防淞沪的十九路军奋起抵抗,“一二八”抗战爆发。此时正值宁粤合作,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长,与蒋介石联合执政。鉴于对日本侵略东北的不抵抗政策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上海又是国民政府的经济中心,国民党不愿重蹈“九一八”事变的覆辙。汪精卫提出“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针,获得蒋介石的赞同,对十九路军抗战给予了支持,随后派第五军参战,给日本侵略军以沉重打击。但同时蒋介石和汪精卫为了不使战争持久扩大,又积极谋求妥协。在英美等国的调停下,中日双方举行上海停战谈判,签订了屈辱的《淞沪停战协定》。随即日本便如愿以偿地在东北成立了伪满洲国。

在“一二八”抗战前,国民党即先后发动了三次“剿共”战争。淞沪抗战爆发后,由于当时中国共产党临时中央在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统治下,强调反对日本侵略的同时,必须进行推翻国民党的斗争;对蒋光鼐、蔡廷锴等爱国将领和十九路军做了错误的分析判断,将他们视为反动的反革命的军阀势力,没有能够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失去了联合抗日的机会。而国民党更视中共为心腹之患,淞沪抗战一结束,立即调集军力进行第四次“剿共”战争。

日本早就制定了灭亡中国的计划,侵占东北三省后,又于1933年3月进占热河,进而大举进攻长城各口。华北危在旦夕,中国守军在长城沿线与日军展开激战,予以重创。由于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指导,长城抗战最终未能坚持,而与日本签订了妥协屈辱的《塘沽协定》。

1935年日军越过长城,开始入侵华北,制造事端,挑起冲突,迫使国民党认可了后来日本所指称的“何梅协定”,并签订了《秦土协定》。中国在华北的军事力量从此大大削弱,华北几乎成为非武装地带。紧接着,日本便以军事力量为后盾,策动华北“自治”,企图使包括河北、察哈尔、绥远、山东、山西在内的华北五省脱离中国,变成第二个伪满洲国。在此亡国灭种的惨祸迫在眉睫的危急时刻,在国民党内部,除了汪精卫等极少数亲日派分子主张继续“忍辱求全”,妥协退让外,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国民党上层领导人物都采取了较强硬的立场,迫使日本分离华北的阴谋未能得逞。

华北事变向中国人民再次敲响了警钟,引起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的严重关注,知识分子尤为敏感。处于华北前线的北平学生发出了“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的沉痛呼声,为挽救危亡而奋起救国,发起了“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与此同时,上海知识界人士也发起救国运动,成立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他们发表救国宣言,痛切地指出:“‘以土事敌,土不尽,敌不饜。’在这生死存亡间不容发的关头,肩负指导社会使命的文化界,再也不能苟且偷安,而应当立刻奋起,站在民众的前面领导救国运动!”1936年1月28日成立包括文化界、妇女界、职业界、大学教授等组成的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随后又与全国各地的救亡组织联系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全救会要求国民党改变“先安内后攘外”的错误政策,停止一切内战,全国各党派团结一致,抵御外侮,制定共同抗敌纲领,建立一个统一的抗敌政权。从此打破了“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抗战时期蓬勃发展的群众抗日运动被压制后的沉寂状态,南北救国运动进入一个狂飙突起的新时期,对于后来

推动抗日战争的进程具有重大意义。

30年代初,蒋介石基本结束了军阀混战割据局面,初步统一了中国后,总揽兵权,控制全局,“创造了全盛的军事时代”。1933年,从国民党内部分裂出来的抗日民主派李济深、陈铭枢和黄琪翔在福建发动抗日反蒋的事变,但在蒋介石的军事进攻和分化瓦解相结合的压力下,很快归于失败。1936年,广东陈济棠和广西李宗仁、白崇禧,为了保存其两广的半独立状态,同时受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又打着“出兵抗日”的旗号,发动反蒋的“六一”事变,旋被蒋介石的分化收买所挫败。

1932年—1933年蒋介石发动的第四次“围剿”苏区的战争失败后,接着又倾全力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大规模的“围剿”战争,暂时取得了胜利,红军经历长征艰辛退处西北一隅。由于华北事变后中日矛盾进一步上升,民族危机加重,抗日救国运动的开展,1935年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后,蒋介石及国民党的内外政策开始有了一些变化,抗日倾向增长,对日外交趋向强硬,并有效地抗击了日本和伪蒙军对绥远的进攻,其“安内攘外”的政策有所淡化,但并没有完全放弃。1936年11月,正当上海救国运动蓬勃发展的时候,国民党开始进行镇压,逮捕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负责人沈钧儒等七人,投入苏州狱中,是为著名的“七君子”事件。

国民党的“安内攘外”政策,从一开始就遭到许多爱国民主人士的反对。特别是华北事变后,要求国民党改弦更张,团结一致,共御外侮,挽救危亡的呼声日益高涨。这也影响到国民党一些上层人物和高级将领政治态度的改变,张学良的思想转变就具有典型意义。张学良1934年从欧洲回国后,接受了蒋介石“剿共”的任务。但他在两年多的“剿共”内战中一再失利,损兵折将,开始省悟到追随蒋继续进行内战,不但于国不利,对自己也没有出路。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下,他终于由“安内攘外”政策的拥护者,转而成为它的反对者。他暗中与中共和红军进行联络。张学良几次向蒋介石诤谏,恳请他认清形势,改变政策,停止内战,释放上海被捕爱国领袖,共

同抗日，遭到蒋的严厉申斥拒绝后，终于被“逼上梁山”，联合杨虎城走上了兵谏的道路，于1936年12月12日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无疑对蒋介石也是一副清醒剂。他开始认识到内战不可能再继续进行下去，团结一致抗日，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如不放弃“安内攘外”政策，就无法继续维持其统治，因而不得不同意“停止剿共，联共抗日”，并保证“停止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释放爱国领袖，西安事变因此得以和平解决。接着国民党召开五届三中全会，讨论国共关系、对日政策等问题。和平统一，抗日救国，开放民众运动，实行民主宪政，聚集人才，保护救国运动，成为与会中委们的共识和一致呼声；并做出了相应的有关决议，显示出与共产党重新合作的意向。此次全会是国民党内政政策基本转变的开始，标志着国民党已从十年内战、独裁和对日妥协，开始转向联合中共及其他社会政治力量走共同抗战的道路。

然而，历史是在曲折中前进的。国民党虽已开始由内战向抗战方面的转变，但并没有彻底转变，尤其是对人民群众的抗日救国运动继续采取压制迫害的政策。国民党没有完全履行蒋介石在西安事变后的几项承诺，反而扣押了送蒋回京的张学良，准备向西安发动军事进攻；并以“危害民国”罪对“七君子”提起公诉，随后江苏高等法院又两次开庭审理，企图定罪。

华北事变后国内政治格局的上述变化，促使中国共产党在政策上进行调整，这种调整反过来又影响政局的转变。1935年中共发表了“八一宣言”，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随后国共两党代表通过多种渠道秘密接触，就停止内战、合作抗日问题进行谈判。1936年下半年中共开始放弃反蒋的方针，由“抗日反蒋”改为“逼蒋抗日”。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派周恩来等前往调解，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停止内战，起了重大作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前夕，中共中央为争取实现停止内战，促进国共两党重新合作，迅速对日作战，致电国民党中央，要求将停止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等定为国策；并相应作了重大